

全球化浪潮下傳統文化的再省思 — 跨國學術合作可能帶來的刺激

孫治本*

一、關於傳統與現代的研究

大約到近十年前，學界不乏關於「文化與經濟發展相關性」之研究（參閱金耀基 1985: 3-35, 229-252, 443-461；黃光國 1988；董正華等 1999: 289-324）。這裡所謂的文化主要是指某個國族或宗教的文化，經濟發展則指與現代性一起產生的理性化生產方式的發展。特別是華人社會中的知識界，以及西方的東亞研究圈，這個議題曾受到頗大的關注，因為這涉及中國或其他東亞國家的傳統價值是有利於還是有礙理性化生產模式的問題。

在筆者就讀大學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Weber 1988a）；英文譯名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在臺灣、香港和美國的華人知識圈頗受注目，因為如果基督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誕生有著選任的親和，那麼東亞價值是否亦能與現代資本主義產生選任的親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東亞國家是否無法實現經濟的現代化？韋伯的另一部著作《儒教與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Weber 1988b），似乎顯示中國並無有利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傳統。然而，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就，使得許多研究者相信應該存在著某些有利經濟現代化的東亞價值，而華人知識界自然會聚焦於儒家傳統與經濟發展間的相關性。其中，回應韋伯學說最具份量的論著當推余英時教授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余英時 1987）。

不僅如此，過去華人知識界談到華人社會的民主化進程時，也會注意到中國傳統中是否有民主精神或有利於民主化的因子。就清末民初的實際狀況

*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人文社會學系合聘副教授，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而言，中國應該是在遭受西方列強的壓迫後，爲了避免淪爲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才開始對西方的政治制度產生興趣的（參閱徐宗勉等 1996: 7）。那麼，起源於西方的民主制度似乎與中國的傳統無關，而如果民主化與文化有關，則不具備民主傳統的華人社會必須高度西化，才有可能走向民主。然而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某些人認爲中國傳統中已具備自由、民主的精神（參閱金耀基 1985: 232-234），如此，華人社會的民主化可能會較爲容易。

以上關於國族、宗教、文化是否會影響經濟、政治現代化的討論，已在近十年間逐漸於華人知識圈中沒落。筆者從對全球化的研究及對輿論的觀察中，覺得這種討論沒落的原因如下：冷戰結束後，世界進入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由於通信、交通科技的進步，以及生產過程自動化、標準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製造業的全球分工規模日益擴大，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攻勢亦是勢如破竹，版圖大增。如此一來，由於任何文化區域都可能被經濟全球化的力量滲透，那麼經濟發展似乎主要是技術和資本主義逐利本質的問題，而與國族、宗教、文化無關。

再者，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確立了其經濟大國的地位，但由於中共建政後對儒家傳統不是破壞就是不提倡，因此如果說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成功要歸功於儒家傳統，實在有些牽強。而在台灣民主化之後，中國的民主化似乎亦是一個普世價值如何實現的問題，不涉及中國傳統是否具有自由、民主精神。

二、狄百瑞：《中國的自由傳統》

這幾年筆者對相關問題的想法亦傾向於上述的轉變。不過，當筆者讀了美國漢學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ry）的《中國的自由傳統》（De Barry 1983b）後，覺得對這個問題還有再思考的必要。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深入討論中國是否有自由傳統，而是想談一談跨國學術合作能對我們理解自身的傳統文化產生何種刺激作用，以及如何透過串聯國內外相似的研究、課程、學程主題，還有學術學會和大學內部的教學、研究單位等，以促進跨國學術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以下在簡單介紹狄百瑞的論點後，要談一談筆者與該書結緣背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學會、學程、學術機構，以及正在發展中的跨國學術合作。

狄百瑞《中國的自由傳統》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均出版於 1983 年，裡面

收錄了他 1982 年於香港中文大學擔任「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時的五篇演講，中文譯者是李弘祺教授（現任交通大學人社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委、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狄百瑞主要是從宋明的新儒家（新儒學）思想中尋找中國的自由傳統，在書中他論述了朱熹關於自由教育的理念、新儒家思想中的個人主義、黃宗羲的自由思想。朱熹反對為科舉、為他人而學習，倡導「為己之學」（De Bary 1983b: 16），這是一種注重個體的思想。明代的李贄更為激進，他鼓勵個人應從傳統中解放出來，狄百瑞認為其思想很接近西方的個人主義（De Bary 1983b:95）。在學習方法上，朱熹強調學習者的自動自發和獨立思考，重視討論、對話（De Bary 1983b: 36-39）。他還主張「博聞之」是學習的起點，強調「博學」，反對只鑽研一經一子。狄百瑞認為這是一種寬容、開放的態度，因此具備了自由精神（De Bary 1983b: 39-41）。新儒家思想亦提倡懷疑精神，這不僅是一種學習方法，也意指對文化、學術傳統的懷疑（De Bary 1983b: 69-70）。黃宗羲是這種懷疑精神的代表人物，他的《明夷待訪錄》即批評了中國的朝代政治（De Bary 1983b: 97-98）。此書並提倡普設學校，因為黃宗羲認為教育是平民百姓參與政治的管道（古時學校曾是社團和政治活動的中心）。而且，他提倡多元學術觀，反對政府主導的正統思想（De Bary 1983b: 102-104；參閱 De Bary/Lufrano 2000: 4-17）。在中國的史官、諫官傳統中，狄百瑞也發現了維護言論自由的機制（De Bary 1983b: 120）。

以上簡單介紹了狄百瑞從宋明新儒家思想中所發掘的自由傳統。需注意的是，在《中國的自由傳統》第五講中，狄百瑞主張不能從某種狹義的西方定義來理解自由主義（De Bary 1983b: 127-128）。如果用比較廣義的視野，則可以發現中國傳統中也有自由主義。反之，「如果認為自由主義唯有存在於過去的西方，認為是舶來品，不能與中國的生活及文化方式融合的話，那麼這也有可能因此反而破壞了讓它從自己的根本自然滋長的機會，更破壞了今日世界和平生存而必然要接受的文化交流」（De Bary 1983b: 128）。在演講的最後一段，狄百瑞肯定說：「我這些演講所要說明的不外就是維護上述自由的思想。但這些思想並非錢穆所說是西方的，其實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固有的觀念」（De Bary 1983b: 131）。

《中國的自由傳統》使筆者重新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之間的關係。即使中國的經濟現代化與傳統價值關聯不大，然而中國傳統中有無民主、自

由的因子卻可能在較大程度上決定中國民主化的難易程度。探索狄百瑞更早期的著作，即他在 1970 年編著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其中他撰寫的〈晚明思想中的個人主義和人文主義〉(“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明確表示，關於個人主義的討論存在於中國的過去和現在 (De Bary 1970: 146)，而王陽明學派內曾經興起明顯具現代特徵的某種個人主義思想 (De Bary 1970: 223)。

即使在全球化日益深化之際，狄百瑞於 2005 年重返香港中大演講時仍肯定地說：「被正確理解和實踐的儒家教育，能對未來的民主有所貢獻。」(De Bary 2007: 20) 直到最近，2007 年狄百瑞等編著出版的《儒家傳統和全球教育》(*Confucian Tradition & Global Education*)，顯示其仍然認為全球視野的培養不能忽視儒家思想。

三、圍繞著「經典」建立起來的跨國學術合作及對傳統文化的研究

篇幅的限制使本文不適合繼續討論中國傳統對中國的民主化有何助益或阻礙的問題，以下筆者將針對《中國的自由傳統》發表會議論文背景，及其引發或計畫中的學術交流、合作，談談如何逐步建構出一種能刺激我們反思傳統文化的跨國對話機制。

2008 年 11 月 28 至 30 日，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主辦了「自由學藝與傳統：通過東西方核心經典作品的研讀來深入對話與體現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於該研討會的合作對象之一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該系資深漢學家狄百瑞為此研討會寫了書面賀詞，並提供了〈我們為什麼要讀《論語》〉(Why We Rea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由台南大學朱榮貴教授譯為中文)的書面論文 (De Bary 2008)。哥倫比亞大學的 Douglas A. Chalmers 教授和 Conrad Schirokauer 教授親自出席了該次研討會。兩位教授都介紹了哥倫比亞大學「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 中的東亞經典閱讀 (Chalmers 2008; Schirokauer 2008)。「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及中東委員會」(The Columbia University 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副主任 Rachel E. Chung 則提供了書面論文。由於這場研討會與哥倫比亞大學及狄百瑞教授的關聯性，李弘祺院長特別囑附筆者針對狄百瑞的《中國的自由傳

統》做報告。

上述研討會的舉辦可以說是哥倫比亞大學於 2008 年 1 月 19 至 20 日主辦的 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Core Curriculum 國際學術研討會¹的後續發展，李弘祺院長出席了這場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事實上，在 2008 年 1 月和 2008 年 11 月的兩個研討會之間，交大通識教育委員會還在 2008 年 5 月 24 至 25 日主辦了「東亞地區大學核心通識課程中的經典閱讀」國際學術研討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及文化學系的商偉教授在該研討會上做了報告。

2008 年 11 月交大主辦的研討會上另一位重要的論文發表人是「核心文本暨核心課程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Core Texts and Courses; ACTC) 執行長 Joseph Scott Lee 教授。Lee 也參加了 2008 年 1 月哥倫比亞大學主辦的研討會。他在 11 月的會中除了發表論文，也邀請我們參加 2009 年 4 月 16 至 19 日在美國孟斐斯 (Memphis) 舉行的該會第十五屆年會，以擴大雙方的合作。筆者參加了 ACTC 今年的年會，會中 Lee 對筆者表示，希望與台灣、香港、中國大陸重視經典閱讀的高等學校發展持續的交流與合作關係。明年該會擬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於紐約市近郊舉行年會，年會前希望能有一針對東亞經典的會前會，希望我們能參與策畫該研討會。

ACTC 年會之後筆者至紐約市拜訪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商偉和 Rachel E. Chung，他們希望不僅能針對經典閱讀和交大通識教育委員會繼續合作，也希望在中國文化與思想的研究上與交大通識教育中心和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作。是故，交大可望在今年再舉辦一次關於經典閱讀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筆者也答應 ACTC 執行長 Lee，為他引介實施經典閱讀頗有成績的台灣元智大學，以及想推動經典閱讀學程的廣州中山大學。

以上 2008 年 1 月到 2009 年 4 月間的四場國際學術研討會，涉及學術機構、學會，以及經典閱讀、東亞經典，和中國思想與文化的研究。筆者想談一談如何透過連結這些彼此相關的機制、概念、研究主題，建構出關於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研究的跨國對話和合作團隊。

首先，上述四個研討會彼此有延續性或關聯性，而且涉及了固定的學術機構和學會，即哥倫比亞大學、交大通識教育委員會和 ACTC。這些固定的

¹ 該研討會的論文集結成 *Classics for an Emerging World* (De Bary/Shang/Chung 2008) 一書，由「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及中東委員會」(The Columbia University 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出版。

學術機構或學會，可以利用持續舉辦的互有關聯的研討會進行學術交流。這四個研討會都與經典閱讀有關，因此涉及課程、學程規劃和教學方法，但也涉及對經典內容的分析，亦即與思想、思潮的研究有關，因此幾個固定參與的學術機構可以透過這些研討會所搭建的交流平台，針對共同的研究興趣開展合作研究。

以 ACTC 年會為例，由於美國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²) 特別重視經典閱讀，因此該會年會的參與者多半來自這些小型的文理學院。美國頂尖的私立大學中亦可能有專門培養大學部學生的學院，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的「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而由於哥倫比亞學院的核心課程學程 (Core Curriculum，相當於台灣的通識課程) 非常注重經典閱讀，因此哥大亦是 ACTC 的積極參與者。交大和哥大持續參與 ACTC 的學術活動，有利於交大和哥大間的學術合作。不僅如此，台灣學者可在 ACTC 年會上體驗美國高等學校對經典閱讀的重視，以及他們對中國傳統的興趣，從而體會在全球化浪潮下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和跨文化對話有何等的重要性。

以筆者的經驗為例，筆者是因為 2008 年 11 月交大主辦的關於經典閱讀的研討會，而研究及報告了狄百瑞關於中國自由傳統的論述。不僅如此，參與這場研討會和 ACTC 年會及親赴哥大參訪，也讓筆者認識了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學院核心課程的規劃，以及東亞經典在該學程中的地位。西方以外的經典，哥大將其放在核心課程學程中的「全球核心課程」(Global Core)³，而狄百瑞教授為了推動東亞經典的閱讀，編譯了好幾部東亞經典選集，其中關於中國的是兩大冊的《中國傳統文獻》(*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De Bary/Bloom 1999; de Bary/Lufrano 2000)。瞭解了哥大對中國經典的重視，探索了狄百瑞對中國傳統中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研究，和他對中國民主化的想法，以及儒家思想在全球教育中可能的貢獻，使筆者重思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民主化過程間的關聯性。再進一步透過 ACTC 搭建的另一個交流平台，及親自拜訪哥大東亞語文及文化學系，使得雙方發現該系亦可與交大開展研究合作的關係。

² 如其不附屬於某大學，通常只提供學士學位。

³ 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學院的「全球核心課程」(Global Core) 請見網址：<http://www.college.columbia.edu/core/classes/mc.php>；可特別注意其中的“Global Core preliminary list of courses 2008-2009”和“Major Cultures list of courses 2008-2009”。

對哥大核心課程和哥大東亞語文及文化學系投入東亞經典課程的認識，也使筆者瞭解到哥大這樣的世界頂尖大學如何重視研究－教學的結合以及大學部的通識教育。再者，像狄百瑞這樣的頂尖漢學家，能費心規劃哥大的核心課程，並設計其中的東亞經典課程，且編譯了中國、日本、印度等國的傳統文獻，而這些竟是狄百瑞六十年前即展開的工作（Schirokauer 2008）。

此次美國之行筆者還依李弘祺院長之囑咐拜訪了普林斯頓大學「人文委員會」(Council of the Humanities)，由該委員會主委，哲學系教授 Gideon Rosen 接待。普林斯頓大學人文委員會是一研究機構，然而從 Rosen 的介紹中可曉得他們是如何重視研究與教學的結合。進駐該委員會的研究學者，不論來自校內還是校外，不只做研究而且每學期須開設一門課程。普林斯頓大學部學生有四千多人，研究生則只有一千多人，可以想像，該校的世界知名學者投身於大學部教育的時間比例不會低，人文委員會的研究學者亦不例外，他們教授的課程包括核心課程（相當於台灣的通識課程），也包括經典閱讀。

普林斯頓人文委員會是一研究機構，交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希望能仿效他們，他們結合研究與教學以及投身通識教育的做法很值得我們參考。這使筆者想起 2009 年 2 月拜訪廣州中山大學副校長陳春聲教授時，他告訴筆者一個構想：他有意在該校推動成立人文研究中心和通識教育中心，而人文研究中心的任務之一就是支援該校的通識教育，並從大一新生中進行二次招生，成立一個專門讀經典的學士班。這種重視研究、教學、通識教育、經典閱讀相結合的構想，與美國的博雅教育非常相似。因此筆者準備引介 ACTC 和廣州中山大學交流。

以上所講的研討會、學術機構、學會的串聯，由於涉及到經典，因此既與教學有關亦與研究有關。從美國高等學校對經典閱讀的重視，以及其對東亞經典的興趣，可以使我們反思我們對自己傳統的態度和研究。筆者在德國求學時，因就讀的是哲學院（相當於我們的人社院），須讀一個主系、兩個輔系才能獲得碩士和博士，因此筆者讀過社會學、哲學、文化人類學和漢學系。在漢學系的學習中，筆者發現與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對話，可能有助於我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而圍繞著經典閱讀、經典教學，及研究傳統文化與思想，並持續主辦、參與相關國際學術研討會，再利用這些研討會作交流平台，在東、西方幾個學術機構、學會間建立起持續性的合作關係，且適當地

逐步增加合作機構的數量，則可形成一種針對傳統文化研究的跨文化、跨國對話機制，刺激我們產生新思維。而一個可以接納國、內外學者進駐或參訪的研究中心，是這種跨國學術對話架構中頗為重要的機制。

參考文獻

- 余英時。1987。〈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收錄於同作者：《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pp. 259-404。
- 金耀基。1985。《金耀基社會文選》。台北：幼獅文化。
- 徐宗勉等。1996。《近代中國對民主的追求》。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 黃光國。1988。《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台北：巨流。
- 董正華等。1999。《透視東亞「奇蹟」》。上海：學林出版社。
- Chalmers, Douglas. 2008. Fundamental Ideas and Education: Means of Fulfilling a Central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on Liberal Education and Traditions, General Education Committee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Sun Moon Lake, Taiwan, Nov. 28.-30.2008.
-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1970. 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 in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ditor):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1983a.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狄百瑞)。1983b。《中國的自由傳統》。李弘祺譯。台北：聯經。
-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2007. Confucian Education and “The Point of Democracy”, in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tc.: *Confucian Tradition & Global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5-22.
-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2008. Why We Rea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nference on Liberal Education and Traditions, General Education Committee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Sun Moon Lake, Taiwan, Nov. 28.-30.2008.
-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Bloom, Irene (compilers). 1999.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ume One –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600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Lufrano, Richard (compilers). 2000.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ume Two – From 1600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chirokauer, Conrad. 2008. East Asia in the Core Curriculum at Columbi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Liberal Education and Traditions, General Education Committee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Sun Moon Lake, Taiwan, Nov. 28.-30.2008.
- Weber, Max. 1988a (zuerst 1920).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in demselbe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Taschenbuchausgabe). Tübingen: J. C. B. Mohr, pp. 17-206.
- Weber, Max. 1988b (zuerst 1920).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in demselbe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Taschenbuchausgabe). Tübingen: J. C. B. Mohr, pp. 276-536.